

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

——对俄罗斯近年出现的所谓“重评思潮”的剖析

马 龙 闪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近些年俄罗斯出现的有关斯大林的评价和言论,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建立俄国“稳定”和“秩序”、体现“强国”和“铁腕”的符号来谈论的,并不是作为苏共的政治领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创造者和实践者来评价的。文章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民族的心理、民族的性格,强烈的大国情结,强国意识,以及苏联解体以来出现的国力下降、经济衰微、人口减少,和严重的社会民族危机等方面,对近来我国学界出现的“重评斯大林说”提出了质疑。文章对近年俄罗斯出现的某些怀旧情绪和对“第二个斯大林”的呼唤所作的解读是:俄罗斯实质上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

关键词 俄罗斯 呼唤铁腕 强权 质疑 重评斯大林

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不少人都这样说:“俄罗斯是个难解之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俄罗斯的各种事态发展和社会政治思潮,笼罩着许多难解的谜团,而不少发生的事件又往往难以预料,这就使得人们大多不敢轻易预测俄罗斯的事态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俄罗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就不可认识;说它是“难解之谜”,也只是透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即俄罗斯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其国情是一个较难认识的现象,不可用衡量、研究其他一般国家、一般事物的普遍标准和尺度来对待它。对于俄罗斯问题,非但不能用直观思维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甚至也不能用平面思维、一元思维来思考它,而是要通过立体的、多维度的思维,从历史的、现实的、宗教的、文化的、民族心理的等等视角进行综合性考察。如若采取直线思维的方式,或者抱定先入为主的观念,用为先验目的服务的态度来运用资料、剪裁资料,以此对待俄罗斯问题,必定会失之偏颇。

苏联解体以后,由于俄国疆土缩小,人口减少,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社会经济危机严重;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而社会保障体系又突然崩溃,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遽下降;也由于国家权力削弱,社会动荡,犯罪率上升,人们安全得不到保障;加之国家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民族自尊心严重受挫,更由于车臣问题引起接二连三的恐怖事件,对社会人心造成巨大冲击——这种种问题,造成近 10 年来在俄罗斯社会上,在其特定群体或一部分人当中,发出了呼唤“斯大林”的声音。特别是在 200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 50 周年前后,在个别地方和一部分人中举办了纪念斯大林的活动。比如,在莫斯科“巴库”电影院就曾举行纪念晚会,不断传出歌颂斯

大林的歌曲。也有人专门开设网站,集中了较多正面评价斯大林的信息。俄学术界也确乎有一些人在评论中出现了提高评价斯大林的音符;民意调查中也显示出了诸多怀念苏联时期“稳定”和“秩序”的情绪等等。鉴于此,我国有学者把上述现象视为俄罗斯在“重新肯定斯大林”,出现了所谓“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热潮”^①。

怎样看待俄罗斯出现的这类现象?怎样从俄罗斯变幻起伏的政治发展中,从其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潮中去把握这类现象,怎样透过此类现象去认识潜藏在其背后的历史本质,这不是以直观的平面思维,从人们言谈行为和社会事态的表象中就能简单得出结论的,而必须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出发,从分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近年的社会现实状况着眼,透过迷乱纷繁的表面现象,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进行仔细而深入的观察,才能透彻把握这一现象的本质。否则,只能抓住一些表面的枝节现象,而并不能得出准确而可靠的结论。

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的某些地方的确出现了呼唤“斯大林”的现象。但怎样认识这一现象,特别是怎样解读“斯大林”这一称谓——是把他作为20世纪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创造者和实践者来呼唤,还是主要把他作为一个建立俄国“稳定”和“秩序”,体现“强国”和“铁腕”的政治符号来呼唤的,这是需要着力弄清的。

首先,需要来看看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俄罗斯曾长期是一个高度集权并崇尚强权专制的国家。在历史上,各公国诸侯的分裂和割据,曾使它孱弱不堪,屡遭外族入侵和连年战祸,而中央集权和强权专制却给它带来了统一、稳定和强大。这是俄罗斯民族从其几近1000年的历史中得出的一条至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俄罗斯人不曾忘记,12、13世纪,在现今俄罗斯的广大版图上曾分布着大大小小10数个封建公国,互不隶属,相互争夺,内讧不已。鞑靼蒙古、日尔曼骑士团和瑞典利用这些公国间的纷争,一个从东,一个自西,一个从西北,三面而入,各个击破,给罗斯人民带来了连年战乱之苦。最后,罗斯各公国被鞑靼蒙古所征服,各族人民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呻吟了两个半世纪。只是由于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以它为中心形成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才打败鞑靼蒙古,赶走侵略者,各族人民才有了相对安定与和平的生活。

16世纪以前,像马克思所说,蜗居东北罗斯一隅的小小的莫斯科公国还不为世人所知,当时它只有43万平方公里;而半个多世纪后,这里却突然冒出、勃然兴起一个欧洲幅员最大、面积达28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让欧洲和世人大为惊愕。它的君主号称“全罗斯沙皇”,统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首都莫斯科号称“第三罗马”,自命肩负“救世使命”。从此,俄罗斯一天天强大,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二三百年间开疆拓土,疆域扩大近8倍,一举成为威震欧洲的宪兵、赫然而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帝国。

这样一部勃兴的辉煌立国史,是俄罗斯人铭刻心扉的一种念念不忘的自豪和荣耀。在俄罗斯人看来,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有一切;而惟有集中于中央而强悍的权力,才能有国家的强大和繁荣。所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就任代总统前夕,在他那篇表述其施政纲领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向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俄罗斯人并非反常……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

^① 吴恩远:《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要推动力。”^①这是普京对俄罗斯历史传统和国家意识所作的一个深刻而精辟的表述,也准确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在目前阶段的这一迫切愿望,即期盼国家强大而要求出现一个握有强大权力的“铁腕”治国者。

其次,再让我们看看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俄罗斯地处欧洲东部和欧亚大陆的交接处。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便于同各民族的交往和接触。其东方和东南方,在历史上曾经同鞑靼蒙古和游牧的突厥民族相邻,其西方和西北方同日尔曼和北欧民族相接。它接受东方宗法家长制和专制统治的传统,也沫于西方吹来的欧风西雨和基督教文明。由于鞑靼蒙古两个多世纪的野蛮统治阻挡了当时正在西欧发生的文艺复兴向俄罗斯的东渐,俄罗斯受影响更多的则是东方文明和专制制度的传统。许多俄罗斯学者和思想家都深刻地指出过这一点。别林斯基在《小俄罗斯史》中,用不少篇幅谈到鞑靼蒙古统治给俄罗斯人打上的深刻精神烙印。这位深邃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主要是从鞑靼蒙古统治对俄罗斯人风俗习惯、心理性格有过影响的角度来讲的。他认为,俄罗斯人较为隐忍内向的性格和家长制传统同蒙古两百多年的统治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一些较少受蒙古统治的民族,比俄罗斯人更开朗、更豁达,也更少宗法家长制的传统,这同受蒙古统治时间较短,较少受其影响有关^②。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在《蒙古人与罗斯》一书中,则更加集中地、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从蒙古人那里接受到的来自中国的种种影响。作为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更将蒙古入侵前和入侵后的俄罗斯,即基辅罗斯同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认为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和教权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也有较多的发言权;而蒙古人的统治则改变了这种情况,使王权明显上升,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以前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仆从^③。后来彼得一世的改革虽倡导向西欧学习,在其后的200年里使俄罗斯受到西欧的巨大影响,但同在制度、心理、性格和意识层面受到东方文明塑造相比,西欧对俄罗斯的熏陶主要停留在军事、教育和艺术等层面上。西欧文明主要影响的是俄罗斯社会上层,而东方文明则主要扎根于俄罗斯社会的下层,即广大民众之中。如果说西欧文明构成俄罗斯文明的“经”,而东方文明则是俄罗斯文明的“纬”。俄罗斯文明实际上是以西欧科学文化为形式,而以东方制度、社会心态和风习为内容的一种交合式文明。其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意识就是这种交合式文明的反映。

几百年来,俄罗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屹立在欧亚大陆之间,而东正教“第三罗马”的思想,苏维埃时代“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又使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中渗透着拯救全人类的使命。这塑造出了俄罗斯人尤为强烈的大国情结、大国意识和大国主义。这在过去的苏联时代和现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都曾表现得十分明显。世界东西方外交官的许多回忆,都谈到过俄国人在国际交往中大国主义的种种表现。

自从苏联解体,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国脱离苏联而独立以后,俄罗斯的版图实际上又退回到了17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时代。它失去了气候温暖而又富裕的南方,正如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所言,苏联解体又把俄国人赶入了冰天雪地的寒带。

① 弗·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见(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② 《别林斯基文集》(两卷本),第1册,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

③ 维尔纳茨基:《蒙古人与罗斯》,莫斯科1997年版,第370—371页;转引自《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30页。

俄罗斯不仅失去了大片国土,还丢失了一亿多人口。在西边它失掉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在南方则丧失了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天然良港。这使俄罗斯几百年来打开出海口的努力化为乌有。加上经济大滑坡,工业衰败,一下使之沦落到了第二流国家的地步。这是所有俄罗斯人过去连做梦都想不到、亦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灾变,更是心灵深处的一大创痛。这也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悲哀,是其民族历史上最最不堪入目的一页。对苏共的垮台、苏维埃制度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终结,从诸多资料看,俄罗斯人倒较为冷漠,没有多少怀恋,而国家的解体,民族的沦丧,却使俄罗斯人民有剜心之痛。

苏联解体后十几年来俄罗斯社会经济的严重危机,更增添了俄罗斯人心坎上的一层剧痛。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B. И. 多勃林科夫 2002 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时对此问题如是说:“俄罗斯现在经受着自己千年历史上几乎最为复杂、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其命运像现在这样不可预测的局面。”^①

俄罗斯近年来的状况使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大受创伤。1990—2000 年 10 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规模下降 1 倍多,工厂、交通等设备过度老化,造成空中、地上、水下恶性事故不断;工业化发生倒退,只能靠原材料和石油、天然气出口来维持国家生存。俄罗斯学者说,如果现有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下去,俄罗斯不仅会变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料附属国,也会沦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国——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原料附属国。俄罗斯农业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工农综合体的物质技术基础崩溃,国家愈益依靠粮食进口,在许多方面现已失去了粮食的自主和独立性。目前俄罗斯外债已达天文数字,为 1700 亿美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俄罗斯如果再继续维持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它还会成为世界工农业产品首先是劣质产品的倾销市场,甚至成为转移有害非环保生产和保存放射性及其他有害废料的场所。

俄罗斯当前在社会领域也危机重重。近十几年中,其社会领域出现了灾难性恶化的局面,表现为:(1)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酗酒、吸毒和卖淫成为社会的痛点,精神病人、流浪儿童和无家可归者大增。据统计,目前俄罗斯不计算酗酒和吸毒者,心理病人总数达 400 万,流浪儿童达 200—300 万,无家可归者也有数百万之多^②。20 世纪 90 年代末,妓女总数为 300 万人,其中每年有 25 万人以上甚至更多的人到国外从事卖淫活动。俄罗斯学者痛心地说:“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们国家在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③(2)国家权力削弱,法制体系松弛,社会犯罪严重。恶性杀人案逐年攀升。什么人都可能遭到杀害,包括院士、政治家、新闻记者、国家杜马代表、企业家和普通百姓。现在俄罗斯每年有 20 多万人被杀。人人无安全感,天天为自己、为家人和亲朋的性命担忧。社会调查显示,在 1995—2002 年间,有 89%—92% 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不能保障他们的个人安全^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社会安全危机,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使国家权力遭到了很大削弱,他们不断削减国家职能,向寡头廉价拍卖国家财产。这使国家在遇到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时,成了无能为力者。(3)人口减少也成为

① B. И. 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代状况和前景》,莫斯科 2003 年版,第 1 页。

② B. И. 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代状况和前景》,第 7 页。

③ B. И. 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代状况和前景》,第 8 页。

④ 《改变中的俄罗斯:挑战和可能》第 1 卷,莫斯科 2003 年版,第 219 页。

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疾病得不到及时医治,居民营养不良等原因,人口死亡率不断升高;生活和就业没有保证,青年夫妇不愿也不敢生孩子,造成出生率降低。由于生活质量降低,人均寿命由1990年的69.2岁,降到2001年的65.3岁。由于妇女平均寿命较高,实际上男人特别是正值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平均寿命甚至下降到58岁。这使俄罗斯进入世界上寿命最低指标国家的行列。俄罗斯政府医疗和社会保障部部长拉祖波夫在莫斯科一个学术讨论会上说,近10年来,俄全国人口总共减少900万,以平均每年近100万的速度在减少。根据人口专家推算,以2002年10月俄罗斯人口普查结果为依据,尽管俄有大量移民,按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目前的1.442亿人口到2016年最好的情况也会减少到1.387亿,最坏情况会减到1.287亿^①。而如果维持现有人口发展趋势,一些学者预测,到2050年人口就会缩减到1亿。那时候,“俄罗斯就将不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对控制自己幅员广大的领土已无能为力。国际社会将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多半会是在保持法律体面的情况下,力图建立对俄罗斯的控制。那时,俄罗斯据说可能事实上成为一块由外来势力管理的类乎委任统治那样的领地”^②。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使俄罗斯国力大大降低,目前俄联邦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影响力也急剧丧失。它不再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是降到了二流国家的地位。西方现在常常是对之故作尊重,实则已不再认真看待它了。西方在一步步让俄罗斯认识到,它已不能以实力强使西方接受它的什么条件了。俄罗斯近些年在所有方面都在退却。它在独联体中的地位在削弱,也同阿拉伯世界、发展中国家渐行渐远。俄罗斯现在对它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既不习惯又很无奈。

严峻的形势促使俄罗斯民族在探寻一条出路:怎样才能重振国威,恢复大国地位?怎样才能振兴经济,让人民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并获得必须的社会保障?如何才能整顿社会秩序,让人民在出门时不再担心被抢被杀,具有安全感?怎样才能像以前那样,让俄罗斯人抬头挺胸,傲视于人?

试想,以俄罗斯这样的历史传统,以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性格、大国主义情结,上世纪它又有过对斯大林体制刻骨铭心的记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盖达尔、叶利钦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改革的痛苦经历,面对近些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它会怎么选择出路?千条万条,答案归到一条:要有强有力的铁腕人物,要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所以,俄罗斯人呼唤强权、呼唤“铁腕”,这成了近10年来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呼声,也几乎是发自俄罗斯全民族心底的强烈呼唤。

早在1993—1994年笔者在俄罗斯近两年间,就不断听到人们有这样的呼声。当时《俄罗斯报》(1993年11月9日)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民期盼强权》,呼吁采用“铁腕”,呼唤强权人物的出现。这些年,更不断听到这种声音。1999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大学举行过一个题为“1917—1930年代:政权与苏联社会”的圆桌会议,会上有一学者公布了一个社会调查:由于社会经济危机带来人们的怀旧情绪,有80.7%的被调查者认为,斯大林时代拥有纪律和秩序、因此,有44.6%的俄罗斯人主张,今天的俄罗斯需要“第二个斯大林”。当然,也有47.3%

① 《俄罗斯改革:现实和前景》,莫斯科2002年版,第176页。

② B. И. 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代状况和前景》,第14页。

的人坚决反对这一点^①。人们在这里“需要第二个斯大林”，主要是把斯大林同纪律和秩序联系在一起，是把他看作“铁腕”和强权的代数符号，并非其他什么原因。

近些年，俄罗斯在继续呼唤“铁腕”，呼唤强权。这集中表现在2003年12月民主派“亚博卢”和俄共在议会选举中的惨败上，也集中表现在2004年4月总统大选的“无悬念”上。在评论普京为什么能以如此悬殊的优势当选这一问题时，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俣田茂树认为：俄罗斯“舆论调查显示，国民支持强权”，“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主义的要素，国家就难以有凝聚力”。他还引用叶利钦执政时期一位俄罗斯高层人物的话说，“普京的目标是成为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建立一个权力强大，而且对美国具有自主性的体制”。而日本这位学者则认为，“与戴高乐时期的法国不同，俄罗斯面临成为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那样的拉丁美洲权威主义的危险。”^②在这里，无论是谁的分析，都离不开普京要建强大政权，要以强权、权威主义治国的基本判断。

在2003年3月5日纪念斯大林去世50周年的一系列报刊和网络言论中，俄罗斯呼唤“铁腕”和强权的心声表现的更为强烈。在这些言论中，不管是喊“斯大林先生万岁”也好，称斯大林为“伟大历史人物”也好，都是把斯大林同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同俄罗斯的“国家强大和有序”联系在一起，都是把斯大林同俄罗斯“应当有一双强有力的手”，同俄罗斯的“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所以，评价斯大林某些音符的提高，甚至呼唤“第二个斯大林”，其实是呼唤“铁腕”，期盼强权。

我国有学者把上述一切解读为“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民众中涌现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③。这种解读是一种错觉，是不够准确的。

第一，我们说俄罗斯民众中没有出现“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这可以2003年12月俄议会选举中俄共和久加诺夫惨败为最有力的佐证。如果一定要说俄罗斯有人要“重新评价”斯大林，那就是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久加诺夫把斯大林抬得比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的历史地位还高，据说他曾称，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这是对斯大林少有的颂词，恐怕斯大林在世时也很少听到，因为斯大林还自称是“列宁的学生”，还得顾及列宁的地位。久加诺夫这句话可谓是真正“重新评价”斯大林了。既然说俄罗斯“学界和民众中涌现出”称得上是“思潮”的强大潮流，为什么“民众”没多少人投他的票？不仅这个党由原来20%—30%的得票率猛降到12%，而且久加诺夫在这次总统大选中连俄共的候选人也不敢担当，而是把这个候选人让给了别人。这是为什么？如果说在俄罗斯“民众”中存在“重评”斯大林思潮的话，能解释得通这个问题吗？要知道，选票是最能体现人们当前的情绪和思想倾向的；俄共在议会选举中遭惨重失败，而其领袖又不敢充当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说明俄罗斯民众中并不存在“重评”斯大林的思潮。

第二，俄罗斯学界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这可以从近些年俄罗斯学术界出现研究斯大林“大清洗”的热潮为佐证。笔者可以提供一份相当完整的资料，1998—2003年俄罗

① 《祖国史》2000年第1期，第142页。

② （日本）《朝日新闻》2004年3月7日。

③ 吴恩远：《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斯学术界发表了几十部专著、上百篇文章,专门研究、深入清理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至于利用解秘档案研究斯大林体制及其后果的著作、文章,则不胜枚举。至今没有发现在这些著述中有对斯大林反“右派”斗争、农业集体化、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芬兰战争失败、卫国战争初期的失败、战后清洗、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等作翻案文章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个别的,也称不起“思潮”。因为这些都是有关斯大林评价的基本史实,基本史实不变,也就难称“重评”。

第三,俄罗斯官方没有“重新评价斯大林”,更没有为他恢复名誉的“完全有组织的行动”。相反,近些年俄罗斯出现了这样一种动向,各地区普遍由“纪念大清洗受害者”协会各地区分会负责,编写和出版了有关他们本地区20世纪30—40年代大清洗的研究和统计专著、回忆录,或受害者纪念册。出版规模相当大,有些地区的这类著作作为多卷本,甚至达到五六卷之多,而且装潢考究。笔者手中同样有1998—2003年间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可以举出几十种这类出版物的名称,编辑出版地区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西伯利亚、普斯科夫、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鞑靼斯坦、加里宁斯克、托姆斯克、彼尔姆、喀山,等等,等等。其中,有些地区出版的这类著作还一一列出了受害者名单。这些出版物往往成了各地区领导人的“形象工程”。如果说是“有组织行动”的话,这倒实实在在是有组织的行动,有组织地继续清理、研究大清洗及其后果。

第四,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的评价一直都是多元化的,观点各种各样,从来没有统一过,所以无从谈到“重新评价”。在俄罗斯,人们有关斯大林的评价五花八门,基本肯定者有之,基本否定者亦有之;完全肯定者有之,完全否定者亦有之。有人把他推上天,比对列宁、彼得大帝的评价还高,有人把他打入地狱,将他与希特勒相比较。你可以举出目前肯定斯大林的资料,他同样可以拿出当今否定斯大林的证据(这方面的资料实际上更多一些),哪些称得上为“重评”?笔者认为哪些都不是,因为评价本来就五花八门,哪里存在什么“重评”!但是,到底俄罗斯社会、官方和学术界是否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还是有一定判断标准的:官方有无“重评”,得看是否出现有关“重评”的官方文件,有无正式场合下的、比较系统的官方讲话;学术界有没有“重评”,需要看一看重要的史学机构的动态,看一看最重要的几家权威史学刊物的评价。有了上述所说官方和学术界的评价,社会的评价大体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拿这一标准来判断,同样的,迄今还没有见到俄罗斯有什么“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迹象。

第五,说俄罗斯没有出现“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还可以由笔者本人近些年就此问题多次请教俄罗斯学者而得到肯定回答作为佐证。笔者对俄罗斯出现的对斯大林的“呼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已经有所关注,90年代中后期多次同俄罗斯学者商讨、请教。其中最主要的两次,是分别在1997年10月和2003年11月向两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所做的请教。这两位院士虽分别是急进民主派和共产主义左派,但两人几乎都以同样的口吻对同一问题作了笔者答。1997年笔者访问俄罗斯时,请教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A. H. 萨哈罗夫;2003年11月笔者请教的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多勃林科夫。前者是急进民主派,后者是共产主义左派。笔者向他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目前俄罗斯存在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他们几乎用同一语言回答:这样提出问题是恰当的,是错误的,俄罗斯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一思潮;但他们也同时这样说,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比以前更理性、更客观了一些。多勃林科夫院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首都各学术单位几百人的学术报告大会上回

答笔者这一问题的,他还特意回答了笔者提出的关于俄罗斯官方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他肯定地说:现在官方同样没有“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

既然目前俄罗斯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又有这么多人对斯大林发生兴趣,似乎又把对他的评价稍稍提高了半个音符呢?这是为什么?这里需要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严格地说,斯大林的一些功绩,包括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工业化的成就、科学和教育方面的长足进步、社会福利保障等,向来就为学术界和多数人所肯定,很少有人完全加以否定,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就此否定斯大林。现在人们就此肯定斯大林,并不是什么“重新肯定”,而是大多数人向来就没有对此加以否定。至于战争初期的惨败,那是史实,谁也不能否认,但谈及战争初期的失败,并不等于说是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普京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这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并不是“重新评价斯大林”。认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无论在苏联时代或现在的俄罗斯,全体民众和学术界是有比较一致的共识的。

第二,历史研究有这样一个规律:离开历史事件及其当事人的时间越远,对其评价就越理性、越客观。相反,离历史人物生活活动年代的时间距离越短,就越容易受到情绪化因素的干扰,造成非理性和缺乏客观的评价。所以,在学术界,比较严肃谨慎的历史学家,大多不愿意去研究当代人物或同当代时间距离较近的人物,我国老一代的史学家这种倾向十分明显。俄罗斯的史学家也常常爱说这样一句话:“要同事件和人物保持一定时间距离”。对斯大林的研究也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斯大林及其时代越远,对其评价就会越理性、越客观。这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但这不是重新评价,而是更理性的评价。

第三,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又出现“斯大林热”,这同当前俄罗斯存在严重社会经济危机有关。正像有的俄国学者所说:目前人们对斯大林兴趣的增长,“是俄罗斯目前现存深刻社会危机的反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版图缩小,人口减少,经济灾变,国力下降,沦为二流国家;人心异常涣散,社会秩序混乱,人们没安全感,社会保障机制崩溃殆尽,等等。这一切,刺激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情结反弹,人们产生怀旧情绪,全社会呼唤“铁腕人物”、呼唤“强权”,要求“第二个斯大林”。要知道,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夺回波罗的海三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把西部边界向波兰一边继续推延。战前战后,斯大林总共向外推占、侵吞了六七十万平方公里^①。所以,斯大林在俄罗斯人心中,是强国、大国和秩序的象征,是“铁腕”、“强权”的符号。目前俄罗斯人特别是青年人要求这样的人物出现,并不是真正“重新评价斯大林”,并不是要改变对斯大林体制的评价,而是呼唤“铁腕”,为强权招魂,期望建立强大国家。

第四,有学者把民意调查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亲总统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中肯定斯

① 据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国际问题专家提供的材料,斯大林在1939—1945年间兼并它国领土为:波兰19.6万平方公里、波罗的海三国17.4万平方公里、芬兰5.14万平方公里、捷克斯洛伐克1.29万平方公里、罗马尼亚5.1638万平方公里、德国1.6331万平方公里、日本北方四岛5.18万平方公里、中国唐努乌梁海17.13万平方公里。上述共计67.3569万平方公里。

大林人数的增加看作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论据,但是对他们是从何种角度肯定斯大林的,却没有拿出证据。我们说,这两个党肯定斯大林人数的增加恰恰说明,他们是从大国主义、强国情结和主张“铁腕”、秩序角度肯定评价斯大林,而不是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斯大林体制视角肯定斯大林的。众所周知,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正是怀着强国情结,打着强烈民族主义、大国主义旗帜,在1993年选举中赢得选票,登上政治舞台的。日里诺夫斯基带领他的党登台伊始,就呼喊要恢复大俄罗斯,收回出海口,并向南发展,提出要让俄罗斯士兵“到温暖的印度洋去洗皮靴”的著名口号。而这个党的纲领十分明确,就是要建立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至今,这个党的纲领未变,他们会从什么角度肯定斯大林,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至于“统一俄罗斯”肯定斯大林,正是呼唤强权、“铁腕”和秩序,绝不是“重新评价”斯大林体制及其社会主义。他们之中如果有人呼唤“斯大林”的话,那他们心目中的“斯大林”就是普京。这从该党所维护的普京的施政纲领和政治倾向,就明确地表现了出来。

俄罗斯国家杜马于2004年11月23日取消了和谐和解日,即十月革命节。11月7日这个纪念了将近90年的苏维埃节日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令人十分痛惜的。可是我们应对此做出理智的分析。俄罗斯国家杜马之所以会做出这一决定,显然是为普京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所主导,主要由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附议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说把这两个政党中所谓肯定斯大林人数的增加解读为是“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那么,怎样理解他们取消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的这个杜马决定呢?“重新肯定”、“重新评价”作为苏共政治领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创造者的斯大林,同取消十月革命节能协调起来吗?而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政党对“铁腕”、强权、强国论者斯大林的呼唤,同它们取消十月革命节的决定是不相矛盾的,可以统一起来的。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而用“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这一说法则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圆其说的、合理的解释。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他们往往有多重身份,应该分别从多角度对这多重身份加以分析。切不可简单地以单向度的思维去看待这多重身份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就斯大林来说,起码他有两重身份,或者说两重性:一是作为继承俄国历史传统和民族传统的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一是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创造者的斯大林。作为第一种身份,他是铁腕、强权的政治符号,同俄国历史上的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没有什么两样,可以说是个强权治国者,也是一个强国主义和大国主义者,而且差不多同这些帝王一样成功,使俄国由弱到强,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第二种身份,他以僵硬集权、漠视人民痛痒的制度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严重伤害了广大民众、干部和知识分子,使苏联人民疏离、冷漠苏联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最后甚至抛弃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不成功的,甚至是个失败者。在今天俄罗斯国家版图缩小、国力下降、经济衰微、人口减少,面临重重社会民族危机的形势下,俄罗斯出现一些人呼唤作为第一种身份,作为铁腕、强权政治符号的斯大林,是合乎情理的,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也可能会提出疑问:怎么能够这样区分斯大林的两重身份,那岂不是把斯大林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把他统一的思想、人格分裂开了吗?人世间的事,世界上的人就是如此复杂,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对此问题,笔者无须过多做答,只要举出斯大林的一句话就够了——1945年9月2日他就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本投降而作的《告人民书》中

说:“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清算”:“日本早在 1904 年日俄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 1904 年 2 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政府利用沙皇政府很弱这一点,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一带的俄国舰队……1904 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重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 40 年。而这一天终于到了。”^① 请问,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应说的话吗? 日俄战争是日、俄双方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对日俄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侵略战争。最后沙俄虽告失败,也是不该给予同情和维护的。但斯大林在此却完全是用沙俄帝国遗产继承者的心态和口气在发言的,他完全站在了沙俄侵略者一边;在此,他难道是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身份在说话吗? 若此,如果列宁在世,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他们会同意斯大林的这番讲话吗? 在此问题上,他们会把斯大林视为站在同一战线的战友吗? 上述我们说,斯大林作为铁腕、强权治国者,同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没有两样,并用斯大林这句话以资证明,是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的。况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前后,利用各种借口和手段从别国夺去六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与一个信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身份相符吗?

俄罗斯《侧面》周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俄罗斯社会十年来的心态变迁》的文章,通过介绍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艾伯特基金会联合推出的报告《今日俄罗斯公民:自我意识及社会理想》,说明了近些年来俄罗斯人心路历程的变化。该报告披露,近年俄罗斯人的怀旧情绪“进一步蔓延”,苏联情结变得浓重了,“人们对苏联和苏共的认识更趋理性化”,即使是对颇受争议的斯大林时代,“令人联想到的也不单是专制和恐惧,还有秩序、爱国主义、国家威信和民族自豪感”。社会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人”寄望国家和国家领导人,“期望通过强权而不是民主来保障人身安全”;近 6 年来,认为国家主要任务是“成为 21 世纪世界强国”的人,增多了一倍^②。就在这一期刊物的封面上登载了这样一幅照片:俄罗斯大批民众冒着大雨集会支持普京;会场横幅标语写着:“总统先生,我们与你在一起”。杂志封面上的照片和这篇文章显示出了十分清楚的意涵:俄罗斯人期盼强权,希望铁腕治国,一方面呼唤“斯大林”,同时也热情支持普京,可以说,斯大林就是他们心中的普京。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民族的心理、性格、强烈的大国情结、强国意识来看,还是从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国力下降、经济衰微、人口减少,和严重的社会民族危机方面来看,把近年俄罗斯社会表现出来的怀旧情绪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思潮看作是“重新肯定”和“重新评价”斯大林,是不准确的。从目前俄罗斯人的怀旧心态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看,他们更多的是对现实政治和国家领导人的期盼。这从 2003 年 12 月俄罗斯议会选举和 2004 年 4 月总统大选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倾向和思想情绪就看得出来,俄罗斯社会是把普京作为“铁腕”和强权人物在呼唤的。2003 年 12 月,普京特意安排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召开有他出席的“统一俄罗斯”提名总统候选人的会议,就象征性地暗示了他的“钢铁”意志;在 2004 年 3 月大选前,他又进行战略

^①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37—439 页。

^② 《侧面》周刊,2004 年 11 月 15 日。

导弹演习,让俄罗斯人重温大国旧梦;而逮捕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则是表示国家和总统的强大权力不容许其他任何人非分摄取。这一切,都是回应俄罗斯选民目前的心理需要和他们对国家领导人的期盼。俄罗斯近些年呼唤的就是像普京这样的“铁腕”,所以普京上台以来一直能赢得社会的高支持率,这次又能在大选中“毫无悬念”地连任当选。普京作为一个基本在苏联时代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人,他保有某些苏联色彩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是不奇怪的,但他并没有“重新评价斯大林”,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恢复斯大林体制。不过正像英国的《每日电讯报》(2004年11月20日)所说,在普京看来,“把前苏联国家聚拢在自己手中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和政治需要,政策就是利用俄罗斯民众的帝国野心”,寻求恢复超级大国地位。

正是出于上述各种理由,我们对近年俄罗斯社会政治思潮以及从2003年杜马选举和2004年总统大选所透露出来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情绪,可以做出这样的解读: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而不是重新评价斯大林。

[本文作者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浙江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温州 325027]

(责任编辑:刘凡)



国家期刊奖获奖证书

《世界历史》

荣获第三届全国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特颁此证



SUMMARIES OF ARTICLES

A Comment on the Call for the “Iron Hand” and “Power” in Russia: Analysis on the Reevaluation Tendency in Russia in Recent years

Ma Longshan

In Russia, some new appraisals and opinions on Joseph Stalin has been advanced in recent year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ose appraisals and opinions have not taken him as a political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SR nor have they taken him as the creator or as a person who realized socialism on the Soviet model. However, they look him as a symbol of establishing Russia's “stability” and “order” and as the embodiment of Russia's “power” and “iron hand”. The article reviews Russian history, traditions, national mentality, national temperament, complex of great nation, consciousness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the fall of national strength, the economic collapse, a de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the serious social and national crises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And then, it raises a query on the tendency of “Reevaluation of Stalin”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The article gives an explanation on some Russian nostalgia for the past and their call for “second Stali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a call for the “iron hand” and “power” in Russia.

On the Migration of the Surplus Labor in Rural Britain ——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 Shian

This essay traces the courses of British rural labor migration from the Enclosure to the present time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oviding historical demography and relative data on the issue. Historicall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uzzled by the issues caused by the surplus labor in the country, and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surplus labor in rural migration since the Enclosure onwards in order to promote British modernization. The British rural labor migration policies have been frequently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nd they mainly contain four forms——the punishment of the homeless and the vagrants, the development of relief funds, the creating of jobs for the jobless, and the welfare projects for rural surplus labor. The successful and valuable experiences of British rural labor migration are good examples in modernization process.